

← (上接8版)

人才，派留学生前往中国学习，并积极支持对中国进行全面研究。同时，清政府也设立了俄罗斯馆和俄文馆，接受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和留学生来华学习汉、满文，并培养中国的俄语人才。19世纪中叶，已有中国人自费前往俄国留学。到1896年，清政府向俄国送出了第一批“官派”留学生，此后赴俄的官费和自费留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引进、宣传并推广俄苏文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李大钊欢呼：“俄国革命之成功，即俄国青年之胜利！亦即俄国社会的诗人灵魂之胜利也！”瞿秋白宣称：“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是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反帝起义和反帝战争的中心。”鲁迅将俄罗斯文化称为“伟大肥沃的‘黑土’”，从中孕育出了“变革”、“战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与外交上的“一边倒”政策相适应，和苏联的文化交流一度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交往的重点。在上世纪50年代，无论是苏联的政治理论和文学作品，还是苏联的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电影等，中国均加以引进和吸收，以致中国文化中的苏联元素处处可见，有学者认为当时形成了“唯俄国文化是从的大势”。大批中国留学生去苏联学习和大批苏联专家来

直遵循“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精神，充分尊重上合组织各国人民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提倡各种文明和平共处、平等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共同发展，通过推动组织框架内丰富多彩的人文合作，促进不同国家、民族、宗教人民的心灵沟通，取得了丰硕成果。

上合组织建立了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等部长会晤机制，以规划、设计、组织、实施各类合作项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教育合作协定》《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卫生合作协定》《上海合作组织政府间救灾互助协定》《关于加强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国立科研机构科技合作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旅游合作发展纲要》等文件，为各成员国开展多边人文合作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础，使相关合作不断深入发展，呈现绚丽多彩的繁荣景象。

上海合作组织建立了自己的上合组织艺术节，通常在上合组织峰会期间演出体现上合各国特色的精彩节目，展示欧亚大陆历史悠久又丰富多样的文化与风情。上海合作组织创建了上合组织论坛，促进成员国学术机构和专家学者之间的相互协作，就上合组织面临的迫切问题开展共同课题研究，为组织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成为上合组织的“第二轨道”智库。俄罗斯总统普京高度评价论坛的意义，认为“论坛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视，该论坛将把专家、学者的代表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独特的非政府专家机制。”按照上合组织成员国教育合作协定的精神，上合各国积极推动交换留学生和学者、相互学习对方语言，还办起了上合组织大学，使之成为上合组织各国教育体系多边协作的创新机构。遵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卫生合作协定，上合组织研究开展传染病防治等方面合作事宜，以提高合作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能力。按照上合组织成员国科技合作协定，上合组织各国努力促进组织框架内多边科技合作的发展，首先开展水资源、农业发展、纳米技术、信息和电信系统，能源和能源储备等领域的合作研究和开发。上合组织救灾合作稳步发展，制订了一系列行动方案，就各国救灾联络机制、信息交流机制、边境区域救灾合作、人员培训和技术交流等具体事项达成共

识。上合组织还积极推动旅游合作，努力开发“丝绸之路”沿线的丰富旅游资源，通过对各民族、宗教的历史、文化遗产及风俗习惯的相互了解来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在当今国际舞台上，人文合作迅速发展，呈现绚丽多彩的态势，而上合组织的人文合作在其中独树一帜，具有不少创新特色。例如，上合组织在国际上最早提出了在网络时代维护信息安全与文化安全的问题，高度重视打击网络犯罪活动，特别要阻止利用网络宣扬极端主义思潮。同时，上合各国均注意在民众中采取预防性措施和进行相应解释工作以抵制错误引导社会舆论的企图，在大众传媒领域建立应对新威胁的有效机制。在2013年9月于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上，成员国领导人重申：“反对将信息通信技术用于危害成员国政治、经济和公共安全的目的，阻止利用国际互联网宣传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想，主张制定统一的信息空间国家行为准则。”在2017年6月的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中国倡议建立上合组织媒体合作机制，并愿意主办上合组织首届媒体峰会。又如，上合组织特别重视青少年之间的文化交流，将其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专门为他们组织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自2005年以来，中国拨出专项资金，为其他成员国培训了数千名不同领域的人才，其中大多数是青年。从2014年开始，中国在10年内向上合成员国提供3万个奖学金名额，并邀请1万名孔子学院师生赴华研修。2004年俄罗斯别斯兰中学遭受恐怖袭击后，中国邀请受到伤害的俄罗斯学生来华疗养。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后，俄罗斯也邀请在地震中失去亲人的中国青少年去俄疗养。

上海合作组织的人文合作增进了不同文明、国家、民族、宗教之间的沟通和互信，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功范例。它为上合组织安全合作和经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增强了上合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不但对欧亚地区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对全球的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显然，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得益于上合组织进程深邃、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上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上合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首席专家、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



戈公振



邹韬奋



戈宝权

学生日益增加。通过互相学习对方语言，了解对方国情，俄罗斯的“汉学”（或“中国学”）研究和中国的俄罗斯研究开始起步。从18世纪中期开始，俄国学者便开始翻译中国文学名著和哲学、历史典籍，如《赵氏孤儿》等。俄罗斯各地建立了一批“汉学”（“中国学”）研究机构，研究范围涵盖哲学、历史、宗教、民族、文学、民间风俗、中医、考古、工艺美术、音乐等方面，出现了一批“汉学”专家，推出了一批专著。如著名汉学家尼·雅·比丘林在1840-1848年间就连续推出了三本关于中国的专著：《中国，及其居民、风俗、习惯和教育》《中华帝国祥志》《中国民情与风尚》，在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苏联当代学者甚至称那个时代的俄罗斯汉学研究为“比丘林时代”。作为比丘林的好友，普希金在《奥涅金》手稿中采用了孔子的论述，显然受到了这些著作的影响。列夫·托尔斯泰则对中国的“道”文化进行了研究，并将其引入俄罗斯精神之域。

相对而言，中国的俄罗斯文化研究起步比较晚，到20世纪初才开始形成势头，其直接的动因便是俄国的革命高潮和苏联的建立。1905年后俄国革命高潮迭起，到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和“成功”。从上世纪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翻译了大量马列主义的文章、书籍。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中国国内翻译出版了列宁著作30多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又翻译出版了列宁著作40余部。抗战时期，延安的马列学院组织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在此期间，许多翻译成中文的俄苏文学作品激励着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民族斗志。“到莫斯科去”，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和左翼知识分子向往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都在这一时期到苏联学习和工作，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张闻天、杨尚昆、任弼时等。一些左翼文化工作者也纷纷造访苏联，如戈公振、邹韬奋、戈宝权、郭沫若、茅盾、胡愈之等。同时，苏联方面也派出许多专家来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和指导中国革命，如维金斯基、越飞、马林、鲍罗廷、加拉罕、加伦、米夫、罗明那兹等。中苏两国的文化界名流在推动双方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鲁迅、瞿秋白、周作人、曹靖华、耿济之、特列季亚科夫、A·A·伊凡诺夫、王希礼、卡尔曼等。

华帮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促进了中苏之间的文化交流。虽然这一时期中国的苏联—俄罗斯文化热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但也因其大范围的推广而具有普及性和群众性，如当时出现在中国出版界的“俄罗斯作品翻译热”、在文学界的“苏维埃英雄情结”、在中国老百姓中的“苏联歌曲热”等等。同时，与以前汉学—中国学研究局限于学者圈内不同，当时苏联也出现了中国文化热，并对一般民众产生了影响。此后，虽然经历了中苏关系恶化和“文革”的冲击，但两国文化交流曾取得的这些丰硕成果始终深深扎根于人民心中，因为“文化就像一个绵延不断的河流……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正因为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俄罗斯及前苏联国家的文化交流能够迅速恢复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进程文化底蕴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合组织人文合作的显著成果

基于上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开展的人文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具有深远的意义。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一